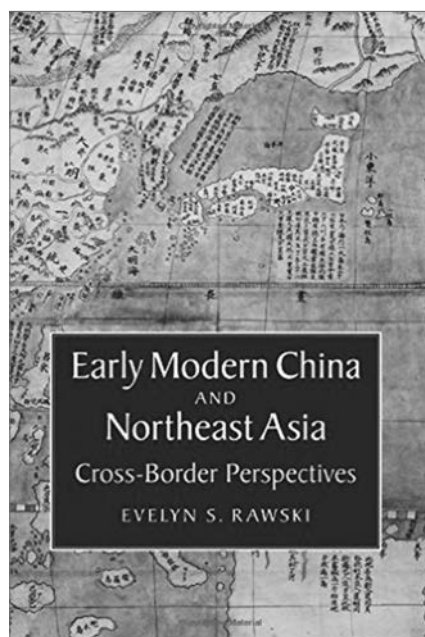


從東北亞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

——評 Evelyn S. Rawski, *Early Modern China and Northeast Asia: Cross-Border Perspectives*

● 曹 寅

在二十世紀很長的一段時間中，有關中國歷史的書寫都是以朝代為基本單位進行的。儘管這種連續的、以漢族為中心的範式讓大眾得以更加簡單明瞭地理解中國歷史，但它也同時遮蔽了那些非漢族的、周邊的、跨國的視角。



Evelyn S. Rawski, *Early Modern China and Northeast Asia: Cross-Border Perspectiv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在二十世紀很長的一段時間中，有關中國歷史的書寫都是以朝代為基本單位進行的。因此，我們

可以讀到的中國歷史大多以「唐代政治史」、「北宋經濟史」或是「清代社會史」等名目出現。而我們所理解的中國歷史則是由這些朝代史依照時間順序拼接而成。這樣的敘述範式留給我們的印象是，中國歷史是連續不斷的，而這個舞台上的主人公則是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以漢族及其文化為中心的「漢化」進程則被認為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主要特徵。與此同時，處在漢族周邊的各民族（如匈奴、鮮卑、契丹、女真等等）被認為是在文化上較漢族低劣的。即使這些民族也曾依靠武力在中國境內建立了政權，但他們的結局往往不是被逐出中原（匈奴和蒙古），就是被漢族徹底同化而湮滅在歷史洪流之中（鮮卑和女真）。

儘管這種連續的、以漢族為中心的範式讓大眾得以更加簡單明瞭地理解中國歷史，但它也同時遮蔽了那些非漢族的、周邊的、跨國的視角，因而使得我們對中國歷史的

理解變得片面和狹隘。以元、清兩代為例，這兩個朝代統治了疆域龐大的世界性帝國，而漢族只是其治下眾多民族之一。如果只是用漢族的立場、語言、史料去解讀這兩個朝代的歷史，並以一個極度簡化的「漢化」概念試圖去詮釋相關的歷史進程，那我們所得到的結論必然是帶有偏見的。

自二十世紀70年代以來，學術界開始對這種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國中心史觀展開了反思。一些學者不再將中國看作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而是承認中國各地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並從地方的角度去解讀中國歷史的變遷^①。除了將中國加以解構之外，另一些學者則嘗試超越中國的疆界，將中國放在區域甚至是全球的歷史進程中加以考察^②。美國匹茲堡大學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歷史系教授羅友枝 (Evelyn S. Rawski) 在這本題為《早期現代中國與東北亞：跨界視角》 (*Early Modern China and Northeast Asia: Cross-Border Perspectives*，引用只註頁碼) 的書中將上述的兩個趨勢結合起來。一方面，她將中國東北部從中國歷史中剝離出來，從地方的視角出發探討該地區與東北亞各國的歷史互動；另一方面，她又從跨國的角度俯瞰東北亞區域的聯繫，以及這些聯繫對區域歷史進程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羅友枝在書中結合了北美「新清史」學派所關注的諸如族群身份認同和國家文化建構等議題，從而超越了以往東北亞史研究側重於政治和經濟交往的局限。

該書由兩部分共五個章節組成。第一部分嘗試從東北亞區域的

視角解讀中國歷史。第一章考察了十六世紀前中國^③中原地區與其東北邊疆以及朝鮮半島和日本的互動，作者認為東北亞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互動在公元五世紀甚至更早的一段時間便已經開始。第二章探討了1550至1650年間中國、朝鮮、日本三國政治生態的變遷。作者強調東北亞各國國內政局的演變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區域性甚至全球性事件的影響。第二部分將焦點轉移至區域內文化互動及其對各國國族身份認同的影響之上。第三和第四章分別以國家禮制和王位繼承權為中心，論述了日本和朝鮮如何引進中國的制度和將其改造並本土化，最終使其更加符合各自統治需要的過程。第五章分析了「華夷之辨」思想在東北亞各國被賦予的不同意義。該章尤其強調明清鼎革之際，滿族入主中原如何改變了東北亞各國知識份子對「華夷之辨」的認知。十七世紀之後，朝鮮和日本的知識份子不再視中國為政治或文化上的中心，而是構建出以各自為中心的「華夷之辨」世界觀。

作為「新清史」學派的代表人物，羅友枝在其以往的研究中提出了一個以滿族為中心的清史研究構想。通過研讀清代滿文檔案，她認為清朝的統治並非是一個「異族漢化」的過程，而是在「反漢化」的動因下通過不斷強調滿族身份認同而建立的一個以滿洲貴族為中心的帝國^④。近年來隨着「新清史」朝帝國史研究轉向，愈來愈多的學者開始突破原先的滿洲中心觀，轉而將清朝看作是一個疆域遼闊、民族眾多，具有多元政治結構以及普世性文化的帝國。帝國史研究中所強調

羅友枝從地方的視角出發探討中國東北部與東北亞各國的歷史互動；又從跨國的角度俯瞰東北亞區域的聯繫及其對區域歷史進程的影響，並結合了「新清史」學派所關注的族群身份認同和國家文化建構等議題。

的跨國、跨區域、全球性視角亦被「新清史」學者所重視和採用^⑤。因而羅友枝的這一著作也可以被看作是「新清史」學派近年來「帝國轉向」的一個代表。

一 中國史中的東北亞？ 東北亞史中的中國？

在本書的第一章中，羅友枝試圖將中國放在東北亞區域史的脈絡中加以考察，從而檢討以往以中國為中心的東北亞史書寫。她認為認識中國東北邊境（以下簡稱東北，泛指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及其周邊地區）對於我們理解東北亞區域史至關重要。首先，東北在陸路上與中原和朝鮮半島相連接，在海路上又與日本相通，因此東北實際上是東北亞區域的橋樑與緩衝地帶；其次，東北歷史上出現的諸多民族和政權積極參與了東北亞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融合，並對中國、朝鮮半島和日本的歷史進程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在三世紀之前，東北亞地區的諸民族通過與漢人政權（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的燕國和兩漢時期的樂浪郡）的政治、經濟互動逐漸形成了不同的政體，即扶餘、高句麗、百濟、新羅等國。到了七世紀，隨着這些政體的逐漸成熟以及向外擴張，他們之間的競爭也開始加劇。羅友枝指出，這些看似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實際上也是在區域的範圍內進行的。譬如，朝鮮半島的統一過程不僅僅是新羅、百濟、高句麗的三方博弈，還包括了唐朝中國和日

本的干涉。而在七至八世紀日本國家形成的過程中，來自中國和朝鮮半島的政治思想、律法條文、制度安排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日本與中國的交往過程中，佛教僧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們不僅將大乘佛教的經典以及一系列的寺院制度傳入日本，還直接參與了日本與亞洲大陸的貿易活動。中國的藥材、絲綢、書籍、瓷器等在日本宮廷和上層貴族中非常流行，而日本出口亞洲大陸的商品主要包括黃金、硫磺和珍珠。朝鮮半島對於日本的影響主要來自於百濟移民。自百濟被新羅滅國後，大批百濟貴族逃入日本，並在日本宮廷中充當了類似於政治顧問的角色，將朝鮮半島的政治制度和文輸入日本。

隨着唐朝中國在九世紀之後走向衰落，中國東北出現了政治真空。東北游牧民族契丹和女真抓住了這一機遇，陸續建立了各自的政權，並崛起成為東北亞的政治新勢力。為了應對這一情況，宋朝中國與朝鮮半島的高麗形成了關係緊密的同盟。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這一期間也成為了高麗的主流意識形態。到了十三世紀，東北亞經歷了一次巨大的變革。蒙古相繼征服了金和南宋，並讓高麗臣服，從而建立了一個幅員遼闊的帝國。在帝國內，人員、商品、信息的流動較之前代更加頻繁。在這期間，東北成為了連接內亞與蒙古、中原以及朝鮮半島的樞紐。各色人等、不同文化，以及來自異域的貨物都匯聚在此地。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蒙元時代的東北不再是中國的邊疆，而是東北亞區域的中心。

羅友枝試圖將中國放在東北亞區域史的脈絡中加以考察，從而檢討以往以中國為中心的東北亞史書寫。她認為認識中國東北邊境對於理解東北亞區域史至關重要，它實際上是東北亞區域的橋樑與緩衝地帶。

隨着蒙元帝國的瓦解，東北亞的權力結構再次發生了改變。日本正值戰國時代，東北亞沿海海盜四起，明朝中國與李氏朝鮮都將注意力轉向了沿海地帶。與此同時，成功開闢新航路的歐洲人也開始在亞洲一帶海域活動，嘗試與亞洲諸國進行貿易並從事傳教活動。從十六世紀開始，東北亞融入進了一個全球性的貿易網絡之中，而全球性的商品、技術、文化流動也進一步影響了東北亞區域內部的互動。從這方面來看，歐洲人的到來加速了已經進行了上千年的東北亞區域整合，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此前的互動模式。羅友枝正是從這一歷史背景出發考察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的東北亞歷史進程。

二 早期現代的東北亞： 交錯的政治史

歷史學家習慣將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末的這段歷史時期稱為「早期現代」(Early Modern)，該時期最大的特徵是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物種、人口、商品、技術和文化的流通。諸如玉米、土豆、番茄等美洲的農產品被歐洲人帶到了歐亞大陸，從而引發了一場農業革命，而歐亞大陸的病毒和細菌則通過歐洲殖民者傳染給了美洲的土著，導致了大規模的瘟疫和人口死亡^⑥。為了攫取美洲的金銀，非洲勞動力被當作奴隸販賣到美洲，而美洲人口結構也因而改變^⑦。歐洲人將美洲的金銀輸往亞洲以換取香料、絲綢、陶瓷等商品，大量美洲白銀的

流入則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和印度等地的經濟結構^⑧。儘管這些現象無一不表明地區間、國家間，甚至是洲際間愈益加強的聯繫，但東北亞相關的歷史書寫顯然沒有對這些跨區域的聯繫給予足夠的重視。

在東北亞，有關十六至十七世紀的歷史書寫仍然是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進行的。日本國族史在敘述德川幕府建立前後的史事時，幾乎千篇一律地將重點放在日本國內的統一戰爭上，而對於豐臣秀吉的兩次侵朝戰爭，日本與中國、朝鮮、東南亞、荷蘭之間的貿易，以及西方技術的引進多是一筆帶過。中國國族史的書寫也有着相似的問題。明清之際的歷史被認為是中國的又一次朝代更迭，史學家往往是從明朝內政的衰敗開始敘述，滿族被認為是一個隸屬於明朝的少數民族。有關滿族的興起以及後金國家的建立則是在明朝朝代史的框架下進行書寫的。滿族興起背後的區域因素，例如明朝萬曆壬辰之役、朝鮮在滿洲與明朝之間的博弈、西方軍事技術在東北亞戰爭中的作用等等，都沒有得到充分的討論。為了打破這種國族史敘事的藩籬，羅友枝在本書中以跨國的視角將東北亞看作一個整體來觀察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的萬曆壬辰之役(朝鮮稱「壬辰倭亂」；日本稱「文祿慶長之役」)和明清鼎革。

隨着十六世紀中期歐洲人來到東北亞，日本和中國都逐漸被納入到了由歐洲人主導的世界海洋貿易體系之中。當時的日本正處在戰國時期，各方勢力極力爭取在軍事裝備上取得優勢。通過與歐洲商人進

在東北亞，有關十六至十七世紀的歷史書寫是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進行的。為了打破這種國族史敘事的藩籬，羅友枝以跨國的視角，將東北亞看作一個整體來觀察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的萬曆壬辰之役和明清鼎革。

羅友枝認為火器和地圖展現了早期現代全球化背景下東亞區域內部的緊密聯繫。一個國家的歷史進程可以因為多種跨國因素在區域內的流動而與其他國家的歷史進程相交錯，而過度強調內部因素的國族史敘事並不足以讓我們完整地了解歷史。

行貿易，諸如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等軍閥獲得了滑膛槍和火炮等先進武器，並在戰場上佔得了先機。在與歐洲商人交往的過程中，日本人不僅掌握了西方軍事技術，更獲得了有關亞洲大陸的情報，而正是這些情報激發了豐臣秀吉侵略朝鮮進而佔領中國的想法。1592至1598年間，豐臣秀吉率領的日本軍隊與中朝聯軍在朝鮮半島進行了一場規模頗大的戰爭。儘管這場戰爭在中、日、朝三國的國族史敘事中都不佔重要位置，但這一事件確實改變了整個東北亞的政治生態。羅友枝認為只有當我們採用一個跨國視角時，這場戰爭所反映出的早期現代世界的全球性聯繫及其所導致的區域性影響才能被更全面地認識。

以西洋火器在東北亞的傳播為例，羅友枝認為，日本在壬辰之役初期能夠迅速擊潰朝鮮軍隊乃是得益於他們所熟練掌握的西洋火器。後來中國從澳門的葡萄牙人手中也獲得了這類武器，並將它們運用在朝鮮的戰場上。戰爭中被俘虜的日本炮手後又被中國和朝鮮政府徵用，並參與了之後與滿洲的戰爭。西洋火器在滿洲征服中國的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同明朝和朝鮮的戰爭中，滿洲俘獲了大量的火器及其操作人員。滿洲人迅速地吸收了這批裝備和人員，並將相關技術廣泛運用在攻城作戰中^⑩。同時，羅友枝認為明朝的覆亡不僅僅是十六至十七世紀中國內部經濟結構的改變及其造成的經濟危機所導致的。從東北亞區域的視角可以發現，明廷在朝鮮半島和東北長達約半個世紀的軍事行動給其帶來了巨

大的經濟負擔，而這也是明朝最終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⑩。

除了火器之外，西方的地圖繪製技術也傳入了東北亞，並深刻地改變了該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十六世紀中期之後，俄國開始了在西伯利亞的擴張活動，沙皇派遣的探險隊甚至出現在清廷的北境。俄國人的出現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覺，並迫使他們採用歐洲國家的方式來看待這種關乎領土主權的威脅。在康乾年間，清政府僱用了大量西方耶穌會士測繪其疆域，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套類似於西方對領土主權和國界的認知。通過這一認知，清朝與俄國簽訂了一系列的邊界條約，進而確定了兩國的邊界。與此同時，清政府在長白山一帶的勘界行為也引起了朝鮮的不滿。作為反制，朝鮮政府也開始僱用西方傳教士在長白山一帶繪製地圖。

總之，羅友枝認為火器和地圖作為範例展現了早期現代全球化背景下東亞區域內部的緊密聯繫。一個國家的歷史進程可以因為多種跨國因素在區域內的流動而與其他國家的歷史進程相交錯，而那種過度強調內部因素的國族史敘事是不足以讓我們完整地了解歷史的。

三 早期現代的東北亞：交錯的文化史

法國「年鑒學派」(the Annales School)歷史學家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認為人類歷史猶如海洋中的潮汐。政治史如同海面，波濤洶湧，瞬息萬變，而社會文化史則潛

藏在表面之下，緩慢卻又深刻地影響着政治事件的發展^①。羅友枝在本書的第二部分從長時段考察了中、日、朝三國在國家祭祀禮儀、王位繼承規則以及知識份子身份認同等方面的文化變遷，她發現三國在文化層面的長期交流及借鑒使得東北亞區域具有了某種文化共同體的特徵。不過，在吸收外來文化的過程中，各國統治階層亦努力將其本土化，並使其更加符合自身統治的合法性需要。這種在外來文化的巨大影響下與將其本土化的嘗試之間的張力，深刻地影響了十六至十八世紀東北亞的政治生態。

在古代中國，國家祭祀禮儀是由祖先崇拜演變而來的。隨着時間的推移，地方信仰、儒家、道家、佛教等諸多因素也逐漸被納入進了各種儀式之中。因此，歷來中國的國家祭祀禮儀與儒家經典中所倡導的儀式並不完全吻合，而是呈現出一種雜糅的形式。到了清朝，薩滿教和藏傳佛教的某些習俗也被應用在國家祭祀典禮之上。從這個角度來看，古代中國國家祭祀禮儀並不是由儒家學說所主導的，而是通過不斷吸納周邊文化而形成的一套多元文化體系。

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日本和朝鮮。作為日本國家祭祀禮儀核心的神道教實際上融合了本國祖先崇拜、地方信仰，以及來自於域外的佛教和道教等元素，因而並非是國族史書寫中所謂的「萬世一系」、一脈相承的傳統文化。在朝鮮，薩滿教和佛教在國家祭祀禮儀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在十五世紀之後，朝鮮的國家禮儀經歷了一個迅

速的「儒化」過程，儒家有關禮儀的規制被編成法典以供朝鮮王室參考。但國家祭祀儀式的「儒化」也帶來了爭議，即朝鮮王室如何處理儒家政治秩序下的名份尊卑問題。因為朝鮮遵奉明朝中國為宗主國，而在儒家倫理中，只有宗主國才有資格進行高規格的祭祀活動，因此朝鮮政府一直嘗試在這一矛盾中尋找某個平衡點——既不違背儒家倫理的要求，又不失去自身主體性。但是到了清代，朝鮮士人在心理上不再視中國為文化中心，甚至有貶低中國之意，因而在國家祭祀禮儀上刻意強調與中國的差異，極力與清朝劃清界限。

東北亞地區文化上的交錯還體現在中、日、朝三國的王位繼承規則之上。在八世紀之前，日本與朝鮮的王位繼承受到族內通婚制的影響，女性（皇后或皇太后）及其氏族在政治上的地位舉足輕重。中國的嫡長子繼承制度在八世紀左右傳入日本與朝鮮，日本和高麗兩國都嘗試引入這一制度以強化王權。譬如在日本，《大寶律令》和《養老律令》將父子相繼的制度以文本的形式固定下來，女性則被完全剝奪了繼承權。但是直到十六世紀，嫡長子繼承制度仍然只是存在於紙面上而已。幕府將軍的繼承人大都不是長子，而是由幕府內的權勢家族選定。儘管朝鮮受到了更多的來自中國的影響，但在王位繼承問題上，高麗和朝鮮也並未完全接受中國的嫡長子繼承制度。李氏朝鮮的國王有一半以上都不是以嫡長子的身份繼承王位的。由於朝鮮的政權合法性源自於中華朝貢體系，中國皇帝

中、日、朝三國在文化層面的長期交流及借鑒使得東北亞區域具有了某種文化共同體的特徵。不過，在吸收外來文化的過程中，各國統治階層亦努力將其本土化，並使其更加符合自身統治的合法性需要。

羅友枝指出頻繁的人員、商品、制度和思想的流動往往伴隨着本土化的過程。這也就解釋了為甚麼如此交錯的文化互動卻沒有最終整合東北亞地區，反而激發了各國自身的身份認同。

的冊封對於朝鮮國王的統治來說至關重要。但是基於中國禮制的限制，中國皇帝只願意冊封具有嫡長子身份的繼承人。因而，以非嫡長子身份獲得王位的朝鮮國王在要求冊封時總是與中國朝廷發生衝突。從上述可見，東亞各國的王位繼承制度是在彼此互動的過程中逐漸演變的，而非所謂的「萬世一系」。

東北亞各國在歷史上對「自我」和「他者」身份的建構也體現了這種文化上的相互影響。「華夷之辨」的思想早在中國上古時期便已萌發，是居住在中原的華夏族群用以強調自我身份認同的一種觀念。之後，「華夷之辨」又與某些儒家教義相結合，成為了一種世界觀，即通過強調儒家文化較之周邊文化的優越性來建構一個中國中心的世界秩序。然而在歷史上的很多時期，這種「華夷之辨」並非是固定不變的，華夷之間的界限也不是不可逾越的，不少漢族知識份子即認為異族可以通過施以儒家教化的方式被同化。朝鮮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這種華夷觀念，並認識到自身處在非中心的位置，這一觀點隨着李氏朝鮮大力引進儒家思想而得到強化。十五至十七世紀的朝鮮歷史文獻常常自稱朝鮮為「東國」、「東邦」、「海東」，稱中國為「天朝」或「聖明」，而稱日本為「倭」。華夷觀念在七世紀左右也傳到了日本。但與朝鮮不同，日本始終拒絕接受那種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觀念，因此「中國」或「中華」等稱謂的使用在日本存在着巨大的爭議。日本官方和民間都更傾向於使用「漢」或「唐」來指代中國。

滿清入主中原之後，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徹底崩壞。作為「夷」的滿族統治者拋棄了「華夷之辨」的論述，轉而強調天命所歸的基礎在於「德政」而非「族類」。就朝鮮而言，他們不再視清朝中國為文化的中心。在朝鮮知識份子眼中，中華文化在滿族統治下的中國已經消失了，而朝鮮則是中華文化的繼承者，是「華夷之辨」中的「華」。就日本而言，明朝的滅亡以及德川幕府鎖國政策的確立使得日本進一步疏離了中華文化圈，同時也逐漸形成了一套以日本為中心的世界體系構想，由是將日本視為「神國」的思潮逐漸地得到了更廣泛的認可，而中國和朝鮮在這一秩序中則是扮演了「夷」的角色。

羅友枝不無道理地指出，頻繁的人員、商品、制度和思想的流動往往伴隨着本土化的過程。這也就解釋了為甚麼如此交錯的文化互動卻沒有最終整合東北亞地區，反而激發了各國自身的身份認同，最終為近當代東亞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四 從周邊看中國：另一種中國歷史論述

近年來，愈來愈多研究中國史的學者認識到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論述不僅無法幫助我們全面地理解歷史，甚至會導致偏見。中原周邊的地區、國家和族群在中國中心範式中被完全邊緣化，並失去了主體性——它們被認為沒有自身的歷史，而只是在不斷地模仿和吸收來

自中原的文化。一些學者主張將注意力轉向中國的邊疆或者鄰國，嘗試以一種不同於以往朝代史或中國中心的視角，重新審視傳統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脈絡。

例如謝健(Jonathan Schlesinger)認為清代蒙古的毛皮、藥材和貴金屬貿易為中央政府帶來了巨大的收益，也由此改變了清政府對於邊疆的態度。清代中期，政府對邊疆貿易與開發的鼓勵使得狩獵和畜牧活動愈加頻繁，蒙古地區的生態環境因此受到了巨大影響，而中原地區的消費習慣也因為大量北方物產的流入而發生了改變^⑭。楊斌則將雲南從中國剝離出來，置入東南亞區域歷史的脈絡之中加以研究。他發現雲南直到十五世紀才逐漸被納入到中國版圖之中，漢族與穆斯林移民的湧入改變了雲南的人口構成和文化特徵，而雲南礦產的開採更深刻地影響了明清兩代中國的經濟結構^⑮。海斯(Jack P. Hayes)考察了十八至二十世紀川北松潘地區的歷史。他認為漢藏邊界地區多民族之間以及他們與該地區自然環境的互動，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近三百年來中國各民族間衝突的根源以及政府民族政策的變遷^⑯。而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更是從2007年開始設立了「從周邊看中國」研究項目，通過搜集和整理域外(主要是日本、韓國和越南)的漢文文獻，嘗試建構一種不同於以往中國中心觀的歷史論述^⑰。

羅友枝這本著作的中心思想正是與學術界的這一「去中國中心」轉向相吻合的。她認為東北亞區域內各種勢力的互動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滿洲、

朝鮮半島、日本並不是中國中心論述所描繪的那種邊緣的、被動接受中華文明的客體，而是通過與中原地區的頻繁互動，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施加了重要影響的行為主體。這種以區域為視角的研究方法有助我們從整體上反思目前主導東北亞各國歷史書寫的國族史範式。當代東北亞中、日、韓三國的歷史研究普遍是在該範式下進行的，將歷史敘述限定在現代民族國家的疆界之內，並強調本民族在歷史上的延續性和文化上的特殊性。然而，羅友枝的研究卻表明東北亞各國的歷史並非是對外封閉的。實際上，由於人口、商品、制度以及思想的流通，這些國家的歷史是被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

該書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今北美學術界在研究早期現代中國時所經歷的範式轉變，即不再強調以中國或中國境內的某些區域為研究對象，而是代之以跨界的視角。然而，該書最大的不足之處在於缺乏原創性。無論是對國族史敘事的批判，還是對文化建構以及身份認同等問題的分析，羅友枝均並未提出新的觀點，也並未發掘新的材料。實際上，書中大多數的論點都已經被其他學者詳細討論過，而該書只是將這些現成的觀點結合起來而已。葛兆光在2011年出版的《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一書中已經就東北亞區域情境下的「華夷之辨」、歐洲地圖知識在東北亞的傳播、朝鮮和日本兩國知識份子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和疏離等議題作了詳細的論述。羅友枝在書中所得出的結論亦與葛兆光非常相似，在史料和方法上不但沒有新的見

本書的中心思想與學術界的「去中國中心」轉向相吻合。滿洲、朝鮮半島、日本並不是中國中心論述所描繪的那種邊緣的、被動接受中華文明的客體，而是通過與中原地區的頻繁互動，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施加了重要影響的行為主體。

解，反而在許多方面落後於葛著。例如，在分析朝鮮知識份子 in 清朝中前期逐漸疏離中國文化的心態時，葛兆光以朝鮮使節訪問中國時所寫的《燕行錄》作為史料，對此議題作了詳盡的分析^①。反觀羅友枝在論述同一問題時，不但對葛兆光的研究隻字未提，所依賴的也多是二手史料。

羅友枝試圖在該書的後記部分指出東北亞各國國族史敘事對於區域和解的負面影響，並呼籲學者採納更多的跨國研究方法。但她對國族史的批判則完全是從中國的角度出發的，韓國和日本的國族史書寫及其對區域關係的影響則基本被忽略了。而即使是對中國國族史的批判，該書也僅僅是強調要突破國族史的線性歷史觀，從不同維度去觀察和解釋歷史。實際上，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早在二十年前便在其《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一書中系統論述過這些觀點，並給出了複線歷史觀 (bifurcated history) 的解決方案^②。

不過，在現今東北亞各國因領土爭端和歷史遺留問題而關係緊張的背景下，羅友枝的這一著作還是能夠凸顯出其現實關懷意義的。在後記部分，她指出當前有關中國歷史的書寫大都是從漢族中心的角度展開的。這一單一視角的歷史敘述既無益於發展與日韓等國的關係，亦會對中國的民族政策造成諸多負面影響。要改變這一狀況，一個跳出漢族中國中心的區域視角是值得

採納的。只有當我們了解到現今居住在東北亞地區的人民其實共享着一段共同的歷史，而我們所認為的那些固有的疆域、文化和身份都是在與「他者」的不斷互動中逐漸形成的，我們才能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爭取到東北亞各民族的正了解。

註釋

① 相關研究參見 Joseph W. Esherick,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Hilary J. Beattie, *Land and Lineage in China: A Study of Tung-ch'eng County, Anhwei, 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R. Keith Schoppa, *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② 參見 Andre G.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濱下武志著，朱蔭貴、歐陽菲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Nicola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David M. Robinson, *Empire's Twilight: Northeast Asia under the Mongols* (Cambridge, MA: Harvard

無論是對國族史敘事的批判，還是對文化建構以及身份認同等問題的分析，羅友枝均並未提出新的觀點和發掘新的材料。不過，在現今東北亞各國因領土爭端和歷史遺留問題而關係緊張的背景下，本書還是能夠凸顯其現實關懷。

University Asia Centre for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2009); David C.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2011)。

③ 羅友枝在書中將「中國」的範圍限定在黃河與長江中下游的漢族聚居區。本文採納她的這一定義。

④ Evelyn S. Rawski,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 no. 4 (1996): 829-50;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⑤ 有關「新清史」的帝國史轉向,參見歐立德(Mark C. Elliott):〈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讀書》,2014年第1期,頁29-40。

⑥ 有關這一時期全球性的物種流動,參見Alfred W. Crosby, Jr.,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Westport, C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72); Alfred W.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⑦ 有關跨大西洋的奴隸貿易,參見David Eltis, *The Rise of African Slavery in the America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⑧ 參見Andre G. Frank, *ReOrient*。

⑨ 有關西洋火器在東北亞傳播和運用的權威著作,參見Tonio Andrade, *The Gunpowder Age: China,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⑩ 石康(Kenneth M. Swope)在其有關壬辰之役的書中也提出了相近的觀點,參見Kenneth M. Swope, *A Dragon's Head and a Serpent's Tail: Ming China and the First Great East Asian War, 1592-1598*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9)。

⑪ 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 Siân Reynolds, vol. 1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⑫ Jonathan Schlesinger, "The Qing Invention of Nature: Environment and Identity in Northeast China and Mongolia, 1750-1850"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2012).

⑬ Bin Yang, *Between Winds and Clouds: The Making of Yunnan (Second Century BCE to Twentieth Century 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⑭ Jack P. Hayes, *A Change in Worlds on the Sino-Tibetan Borderlands: Politics, Economies, and Environments in Northern Sichuan*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4).

⑮ 有關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從周邊看中國」項目的緣起,參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從周邊看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1-2。

⑯ 之後葛兆光更是以《燕行錄》為主題,編寫了《想像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一書,可惜羅友枝在書中亦未對此有所提及。

⑰ 參見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